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Preface to Social Theory of Modernity

刘小枫 著

非外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小枫 著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Preface to Social Theory of Modernity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刘小枫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7810-4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0551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刘小枫文集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著者 刘小枫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h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8.7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7810-4/C·257
定价 58.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重版前记

笔者在1997年版前言结尾时说：“本书仅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片断性言述的开端，笔者将在这种言述中继续切问近思。”仅仅不到一年，笔者就离开“这种言述”，转向了政治法学研究，从此越走越远……

理解现代中国的命运以便更好地开拓中国思想学术的未来，是笔者1978年上大学时心生的学愿。从当时的知识语境来看，这一愿望可谓不知天高地厚。要搞清何谓“现代”及其问题，谈何容易，何况还得先解决凭靠什么知识形态来思考这一棘手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念硕士课程时，笔者隐约感到，社会理论有很大吸引力。这并非仅仅因为，听周围的一些朋友说，社会理论是当今西方显学。毋宁说，走进大学学堂之时，笔者满脑子现代中国历史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太多困惑，百废待兴、时不我待的感觉太强烈，社会理论似乎特

别解渴。

本书是笔者学习社会理论时的读书笔记(因此称“绪论”),它表明笔者曾致力于尝试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这门支配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主流论述。现在回过头看,笔者得承认,自己的心性并不切合社会理论的思维样式和表述方,以致思考和表达都相当笨拙。笔者后来才深切体会到,没有先搞清何谓热爱学问,也就很难看清何谓政治以及应该如何理解历史。本书的尝试向笔者证明:凭靠社会理论看待现代中国问题难免缺乏穿透力,换句话说也颇为局促。换句话说,这种证明仅具个人经验性质,并不适合他人,而社会理论的观察视角以及所积累的研究成果,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

现代中国学术需要新的积累,哪怕是不成功的积累。毕竟,在渴求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学人被迫两次从零开始,难免以盲辨色、以聋辨音。本书致力于认识西方的社会理论,并尝试与中国问题联系起来,多少有些知识上的积累。出于这一考虑,笔者决定重版此书,而非干脆废掉。

原书结构累赘,借重版机会,笔者用正副标题将原书切分为二。这里重版的是原书前两章,后四章以“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为题另行。除订正不准确的表达,删除啰嗦的句子,调整标点和自然段落划分,注释方式也尽可能符合当今规范外,基本观点一仍其旧。

笔者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期间,曾参与《二十一世纪》学刊编辑工作,担任书评栏编审,也偶尔受责评议学界新说。《平等地拥有真理?》(收入本书时,标题改为《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和《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现代性》两文是笔者在港时期所写的评论,分别刊于1997年第6期和2001年第4期,前者因深得一些

朋友喜爱,随后扩展成长文,收入文集《刺猬的温顺》。虽均属受责撰写的时论,这两篇文章留下了笔者尝试换一种思路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历史痕迹,不妨收作附录。

如尼采所说,现代性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漩涡,无论对于热爱学问的个人还是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来说,被卷入深渊的危险始终存在。本稿成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转折时期,它记录了笔者面对强劲而来的“后现代”漩涡奋力搏击时的思考。两篇附录文进而表明,在充满偶然性的历程中,笔者若不是出自本能地拒斥激进思潮的同时也不断自我检审,如今很可能已被历史漩涡卷入自毁的深渊。

刘小枫

2018年3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1997 年版前言

清理 20 世纪学术思想之思绪,对于 20 世纪末的汉语学术界,是一项非但不可规避、更应主动承担的课题。因此可以问:20 世纪的学术思想被什么问题所纠缠,以致知识界不得不一再调整、修正学术的知识建构?在我看来,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是现代现象。为了辨识这个现象,百年来的学术思想动员了各种日益分化的知识性力量,积累了前所未有的人文-社会理论的研究成果。当今,“后现代”论对学问的现代原则的攻击,使现代现象的面目更为复杂难辨。看来,在未来的世纪,学术思想仍将困扰于现代幽灵的纠缠。在这种学术语境中,考察百年来学术思想对现代现象的知性把握及其理论形态,的确是一项紧迫的课题。

现代现象本质上是源于西欧文化基因的历史演化:商业文明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理念的扩张,与欧洲古代的国家形态和理念形态出现裂痕。舍勒(Max Scheler)指出,对欧洲而言,现代

现象(Modeme)是“事物和人的巨大变形”,其程度之深远、触面之广泛,远甚于欧洲中古向近代(Neuzeit)的演化。

商业文明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形成,导致西欧文明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域的社会和理念随之发生现代性裂变,构成了20世纪生活世界的基本现实。对百年前的中国士人而言,现代现象是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就呈现为双重性冲突: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亦是中西之冲突。

如何理解百年来汉语学界持续至今的中西冲突论?汉语思想家中已有论者(梁启超、冯友兰)识察到,中西文化的价值理念之争(体用之争)实质为古今之争,即传统与现代之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现、发展及其全球化过程,引发了政经制度、文化理念和日常生活结构的转型。百年前,中国社会也被猝然拖入这场历史的嬗变。汉语思想与欧美思想一样,在现代语境中发生了根本变化,对现代现象的反应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目,用“鼓吹”或“反对”现代化来界定这些反应都过于简单。

我将从社会理论的位置来审理西语和汉语思想学术的“现代现象”。现代思想学术的重大标识之一是社会理论的形成和扩展,众所周知,社会理论的形成与现代现象及其现代性问题纠缠在一起。社会理论与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决定性差异在于,前者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性学术。总结20世纪的思想学术,首先值得关注关于现代现象的理论建构——我谓之现代学。在思想学术领域,也有一种“现代现象”,即现代幽灵游荡在人文思想和社会理论的言述中,“现代”话语千姿百态。但是,言说“现代”并不必然是一种关于现代现象的知识学建构,它也可能是、而且经常是一种非知识性的个性情绪反应。

尽管现代学的知识言述不可能摆脱个体旨趣和价值立场,然而,在现代学中,实证科学知识将现代现象先予客观化,以便有效地审视之,而非或激进或保守地批判之。

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引发世界各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层出不穷的危机。百年来,德、法、英、美等国的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已有相当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学术文献;汉语学界虽日益关注中国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建构尚处于萌动期。不过,在“后现代”论述攻击下,欧美学界关于现代现象的社会理论已处于遑然状态。

本书旨在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理百年来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讨论迄今为止的社会理论的问题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我着重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带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来审理欧美的社会理论,是基于笔者的个人观点:并没有与欧美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中国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具体性。因此,审理欧美社会理论时引入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不仅必要而且有益。

在本书中,中西二元景观将遭遇进一步挑战。从根本上讲,对西方和中国来说,现代性问题已经命运与共。我并不打算抹杀或忽略现代性问题在中西方思想和社会中的具体历史差异,但我更愿尝试协调中西现代性命运的休戚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欧美社会理论在基本构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均已有极为丰富的积累,建构中国的社会理论,既不可能撇开这些积累,也不应仅限于译述和套用,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本书不想面面俱到地罗列排比欧美社会理论的主流论说,而是依自己的问题意识,有选择

地论涉(哪怕在欧美学界已被遗忘或未受重视的)切己论说。这并不是为了建构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社会理论(这种提法乃基于中西二元景观),笔者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参与社会理论的修葺,从而进一步把握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

笔者留学瑞士巴塞尔时开始构思本书和收集文献。1987年写完《拯救与逍遥》后,我着手研究知识社会学,由此进入社会理论。在研修系统神学的同时,我对社会理论仍葆有兴趣。即使在神学领域,我也无处不遇到现代性问题,这促使我决意审视现代思想学术与现代性的关系。

1993年9月完成学业后,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属内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该所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学风为我写作本书提供了基本保障,香港政府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Programm Grants Committee)的研究基金亦提供了支持。

学术思想有如行路,言路在思路中前行。本书仅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片断性言述的开端,笔者将在这种言述中继续切问近思。

刘小枫

1994年12月初稿于香港

1996年8月三稿于香港

1997年7月四稿于上海

目 录

重版前记 / 1

1997 年版前言 / 1

一 现代学的问题意识 / 1

- 1 “后现代”论述的现代主义性质 / 1
- 2 经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 6
- 3 舍勒和西美尔思想中的现代人身影 / 13
- 4 现代化论、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现代化 / 25
- 5 激进左派、激进右派与风险社会 / 41
- 6 现代学问题意识中三个矛盾的重点词 / 56

二 现代学问题的累积 / 61

- 1 “现代结构”与特洛尔奇的现代学结构 / 61

- 2 近代与中古的关联:两种新教的差异 /65
- 3 “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假问题? /77

三 现代结构的形态和品质 /88

- 1 世俗国家、民族国家、政党国家 /89
- 2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与自由和平等 /101
- 3 世俗化自然法、自治性法律和政党科层法 /116
- 4 科学原则、民族原则与知识人的分化 /133
- 5 艺术与感觉的两极化:可共感与不可共感 /144
- 6 哲学的专业化和肉身化 /151
- 7 主体性道德与政党伦理 /164

四 现代原则及其历史类型 /173

- 1 启蒙运动与自然 /174
- 2 德国唯心论与精神 /181
- 3 19世纪的含混 /185
- 4 民族比较与现代中国 /191

附录

一 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 /201

- 1 “一种平等主义”的现代性理论? /202
- 2 “承认的政治”承认什么? /206
- 3 自由主义“强加于人”什么? /215
- 4 “我们”就是“我”? /222

- 5 自由主义的民族性批判? /235
- 6 谁是资本主义文化侵略者? /240

二 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现代性 /249

- 1 “现代性”之外没有立场? /249
- 2 新自然法及其瓦解 /251
- 3 严复与韦伯的同时代性 /250
- 4 后现代的自然状态 /262

一 现代学的问题意识

1 “后现代”论述的现代主义性质

1980年代,欧美思想界出现了所谓“后现代论”思潮,在各个人文学科领域急速扩张,引发与现代性论述决裂的大论战。“后现代”论者声称:现代性论述的权威基于一个充满危机的精英秩序。

这样的精英秩序也许是世上最后的神秘祭仪,在我们这些被末日灾难和极权主义吓得心惊胆颤的人心中,它们已经不再有位置。^①

^① 哈桑(L. Hassan),《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刘象愚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3,页83;比较S. Best/D. Keller,《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朱元鸿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页36。

言下之意,应该用“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秩序构想置换现代性的文化-社会秩序构想。可是,“后现代”论述的扩张一再返回“现代性”问题,触发了重新理解现代现象的需求。事实上,“后现代”论述一开始就面临双重尴尬。因为,现代性论述的大量文献表明,即使不是所有的、至少也是基本的“后现代”论题仍为百年来的“旧”话新语,以致“后现代”论述的“主义”论证显得颇为费力。^①更为尴尬的是:“现代性”本身尚未清理,当欲取代不清楚的“现代性”而“后”之的“后现代”论述仍然要以“现代性”知识学来界定自身时,却发现“现代性”尚在漂浮之中。“后现代”论述对现代性论述的攻击,实际成了现代性论述的一个激进变种。

作为历史时间的现代概念与作为问题的“现代性”概念不同,史学、哲学和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理解亦有差异。显然,须明确界定“现代性”,才能弄清“后”现代主义论述的攻击对象。但是,确定“现代性”的历史坐标是什么呢?在不同的论域,参照点不同,对现代性现象的历史时间的确定亦不同,因此,很难确定一个现代性现象的统一的历史时刻。^②

尽管如此,所谓现代现象的含义还是可以大致这样来界定:一种普世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每一民族及其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社会化和知识化力量,导致个体和社会的生活形态及品质发生持续性不稳定转变。在现代现象中,社会

^① 李欧塔(J. F. Lyotard)承认,“后现代属于现代的一部分”。参李欧塔,《后现代状况》,见罗青编,《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93,页298。即使在最容易获得支持的文艺批评域,“后现代”的意涵仍然颇受质疑。参D. Fokkema/H. Bertens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页278-316。

^② 贝尔(D. Bell),《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矛盾之解决》,见《国外社会学》,1991(2),页16-20。

和文化制度以及个体的处身位置,处于已然不知自己身处何处的位置。

何谓现代现象之本质?对此现象有敏锐感受性和把握力的德国社会思想家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的如下回答调校了问题的提法:现代现象之本质就在于它根本就没有本质。哈桑描述和界说后现代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的术语——“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早已由西美尔提出并贴在了“现代性”的身体上。^①

如果取消本质是现代现象的实质性标识,那么,这恰恰表明,现象本身成为了本质。把握现代现象的形态结构,因此是现代学赖以成型的基本课题。从形态上看,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它体现为一个极富偶在性的历史过程,迄今还不能说已经终止。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又需要加以区别的结构位置。

我用三个不同的术语来指称现代现象的结构:现代化题域指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指学问观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指生活中的个体-群体心性结构的变化及其相应的文化质态和形态变化。

区分现代主义与现代性十分重要:在迄今关于现代现象的知识学文献中,现代主义少有例外地被用于指那些发生在“精

^① G. Simmel,《现代的本质》,Hamburg, 1990,页341;比较哈桑,《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前揭,页87以下。西美尔对现代性的分析,参D. P. Frisby,《西美尔的现代理论》,见H. J. Dahme/O. Rammstedt编,《西美尔与现代性》,Frankfurt/Main 1984,页16以下,尤其页26以下。